

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公民教育的拓展： 基于活动的视角^{*}

刘 铁 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006)

摘 要: 个体成人不仅系于知识的生长与思想的萌发,更离不开个体切实的行动。学校公共生活建构,需要切实地引导个体参与实际的公共生活。通过活动来引导学生的公共参与,激活学生公共参与的热情,锻炼公共实践能力,唤起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关照,促进他们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生命境界,乃是开启学校公共生活、展开学校公民教育的根本着眼点之所在。学校生动开展的各种活动,可谓学校公共生活建构的基本形式。学校公共活动既是实践学校公共生活理想的场域,同时也为学校公共生活价值的创生与扩展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 公共生活; 公民教育; 公共活动

一、公共活动的展开: 个体成长中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超越

公共活动乃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在其中,每个人的言行能被他人看到、听到,公共活动意味着学生个体可以影响他人,并且接受他人的影响。如果说话语体系的生成乃是在言说中开启个人的公共生活想象,拓展公共价值视野,启迪公共理性,那么,活动就是要让个体切身地实践公共生活理想,活在与他人的生动交往之中,活在公共生活共同体之中,由此而扩展、提升个体生存的境界。

学生个体投身于公共活动之中,让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展现在与他人的关联之中。个体能力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个别训练,而是置于个体与他人、社会的生动联系之中。“一个人的成功,在当下要比在以前更加取决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特定能力的恰当使用,而不取决于他在理论上具有何种能力。……当下最令人感到悲哀者,可能莫过于对下述问题的困惑: 一个人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同胞有助益,以及一个人的才智如何才能不被浪费。”^①

有人这样描述民国时期蔡元培主持教育工作时曾经历的小学生活,“我们在大观读书,不单注意学习成绩,同时也注意体育、美育等各方面。美育、图画,我学的不好,但对音乐兴趣很高,学会了弹琴、吹箫,并特别爱唱歌。至于体育,无论田径运动和各種球类,我样样都爱。我特别爱踢足球,我不只参加一个球队,而且是班队和校队的队员,常常代表全班或全校去参加

^{*}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2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719); 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公民教育的拓展与学校公共生活的重建研究”(BFA100043)

比赛。我对足球的爱好,一直保持到今天。”^②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其中,在促成学生智育、体育和美育等方面充分、和谐发展的同时,也给个体潜能的发现、提升提供了契机,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孕育着个体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各种饶有意义的教育活动,丰富的校园生活,乃是学生得以健全成长的重要途径。“远足及露营是师生们最喜爱的活动,每学期总有两三次,一般在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特别是暑假及春假,为时更长。记得曾去过灵峰、瑞岩寺、古阿育王寺、万湫山……那时候,同学们搭帐篷、挖帐篷四周水槽、挑水、拾干柴、搭灶头、消毒、洗菜、炒菜、煮饭、洗衣袜、采标本、写生、爬山、游泳……既分工、又合作,既分散活动,又遵守纪律。得到的知识似更丰富了,师生关系似更密切了,特别是家事和卫生方面,通过几次露营,会使人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③学生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在得到各种能力的充分锻炼的同时,可以在与他人的生动交往之中获得对他人、学校和社会的积极认同,在显现出青少年儿童积极的生命气象的同时,也展示学校朝气蓬勃的教育精神。这种蓬勃的生命气象,既是学生生命实践的表达,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学生更高的生命理想的生成。朝气蓬勃的生命状态与由此而来学生对自我生命卓越的追求,本身就是学校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各种活动来显现蓬勃的生命气象,这本身就足以成为学校公共活动与公民教育的基本形式。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把归宿感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需求。公共生活的开启并不是一种外加于个体成长之上的规定性任务,而是包含着个体成人的内在需要,内含着个体生命的基本欲求。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让学生在公共参与中获得自我存在的归宿感。我的一位学生曾讲述她儿子的一段经历:长沙市岳麓区某小学是一所地方很有名的学校,她的小孩裴思涵曾经在那里就学。有一次从两米多高的地方摔下来,把腰摔伤了,后面到医院检查,发现问题很大。原来小思涵摔伤的那块骨头原已接近坏死,他得了一种罕见的骨头病,此后一年多一直在病床上度过。其间正好赶上汶川大地震,举国纪念,该小学师生为地震死难者祈福的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播出。病床上的思涵看到了,就跟妈妈说:“不是全体学生,我还在床上呢。”^④小思涵“我还在床上呢”的呼告,在表达病中的他对集体生活向往的同时,也传达出一个年幼的生命对学校共同体的敏感性。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进入公共生活之中,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获得归宿感的需要。学校公共活动的开展就是让这种需要变成鲜活生动的形式。

不仅如此,让学生置身于各种丰富而生动的活动之中,鼓励他们自由自主,民主协商,相互合作,这对于他们的民主个性的养成乃是极其重要的经历。杜威在《民主与教育行政》的文章中写道:“民主的基础是信仰人性所具有才能;信仰人类的理智和信仰合伙和合作经验的力量。这并不是相信这些事物本身已经完备了,而是相信如果给它们一个机会,它们就会成长起来而且能够继续不断地产生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知识与智慧。”^⑤怎样在学校公共场域之中充分地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使尊重生命成为学校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而不仅仅是把生命教育作为某一个或一类活动的主题,避免生命教育流于表浅形式,乃是当下学校公共生活的基本主题。正如杜威所言,“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⑥活动的展开,就是让学生切身地体验如何尊重他人,并且赢得他人的尊重,懂得彼此尊重的公共生活共同体对个人的意义,并且应如何用个人之力来促成这种尊严与价值的共同体的建构。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本身就意味着“让儿童充分地进入生活之中,内化生活为教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扩展人与生活世界的相互作用,在延续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促进生活的更新。杜威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不仅包含着对生活的适应,而且孕育着对生活的改造与更新。”^⑦

阿伦特通过对人的现象学分析指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生命自身、出生和死亡、人的多样性、世界性与赖以生存的大地。人的活动就以它们为出发点。人的根本特点在于:人降生后就要进入社会,与他人交往,所以人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生命,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世界中才能经历自己的现实性。阿伦特把人的基本活动分为三种:劳动,这是一种生物性过程,其基本条件是生命自身,它具有一种生物性的强迫特征;制造,即生产一个持续的、与自然物有别的人工世界,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家园,其基本条件就是人的世界性和人对客体的依赖性,它受功利主义和机械性思想支配;行动,它是行动着的生命惟一具有的一种活动性,它是在没有物体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在人们中间发生的,它的基本条件是承认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即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人居住和生活地球上。只有通过行动,个体才能相互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真理、行动目标、人的本质等问题。根据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学校公共活动的意义就是让个体真实地进入他人之中生存,引导个体在自我生存现实性的体验与领悟中,理解自我、他人与社会,认识人的本质,并且活出人之为人的本质。

二、课堂教学作为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形式

学生大部分的学校生活时光都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堂教学可谓学校公共生活的基本形式。课堂教学是否体现了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是否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来自他人的观看、激励,由此而让自己在他人之中学习、成长,实际上就构成了学生之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课堂教学之公共生活品质体现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活动中所彰显出来的公共价值之中。

课堂教学之作为公共生活形式,最基本的要素在于师生一堂,共同探究,彼此合作,互相帮助,由此而形成互帮互学的公共场域,每个人都可以在此空间中获得自我成长的资源,每个人又都成为他人成长的背景与条件。这意味着课堂教学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以民国期间为例,学校公民科的教学,依据其基本的公民教育理念,已经具备了相当完整的课程体系。而其教学方法,更是不拘一格。如常道直在他的《小学公民课教学法》一文中,便提出了如下公民科的教学法:

第一,要与他科尤其是历史科,联络教授;课程表上虽不妨分列,但至少历史科和公民科要由同一教师教授。这一层自是很容易办到的。

第二,要多用问题研究方法。最好每一教学单元即为一个公民问题之讨论、解决,与实行。系统的研究,不惟在小学公民科中不适用,即在其他各科中亦不相宜。

第三,要注重活动的方法,详言之,在公民科之教学中,当充分领会“学由于做”(Learning by doing)之教育格言。我们所教的,须是学生所能履行的,至少须是他们所能表演出来的。总之,在公民教学程序中,学生应当是一个“身与其事的”,不可只是一个“旁观者”。^③

上述几种小学公民课教学法,实际上蕴含着普遍性的教学诉求:与历史等科联络教授,这是要注重学科知识之间的普遍联系,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注重彼此之间融会贯通;多用问题研究方法,这是要切合儿童能力发展实际,同时也引导他们踏实研讨,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避免教学的空乏;注重活动的方法,则是要学生深度体验,身体力行,避免作为旁观者浅尝辄止。开阔的视野孕育着学生的公共理解的扩展;问题研究方法启迪学生的深入实际,脚踏实地,合作探究的公共生活路径;注重活动,做中学习,则培育学生躬亲实践的公共生活态度。

公共理解与公民教育当然不限于公民课的教学,每一门学科都可以而且需要开启各自通往公共生活与公民人格的窗口。以讨论、辩论、分析、比较、案例研究等多种方式发掘学科教学的公民价值内涵,引导个体的公民行动,这对于个体公民品性成长的历练是至关重要的。

课堂教学形式本身是历练个人的公共生活品质、启迪公民人格的基本形式。教学民主,鼓励个性,培养独立思考、自由探究的思维品格,都是公民人格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形式。我们所需考虑这一核心问题,我们的课堂究竟面向什么而教?是面向教师所呈现的知识世界,还是把学生引向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让学生探玄钩奇,启迪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无限的求知欲,而不是把学生引向僵化的现成知识储备,这乃是我们今日课堂教学的中心问题。一旦教师积极把学生引向对更广阔世界的探索,引向属于学生自己的想象世界,那么,课堂的结束不过是学生面对更广世界的好奇的开始,好的课堂的标准便不是以无问题告终,恰恰是以更多问题的唤起为标志。倡导课堂教学回归生活,走向生活世界,就是要拓展课堂教学的生活视野,在有限的课堂空间里唤起学生无限的成人的欲求。

海德格尔把教育的过程定义为“对一个领域中本质的东西作出符合一致的反应”,从现象学的视角而言,教育的本质乃是培养个体对其周遭的环境作出变化的、更加精微的反应。与之相应,教育的目标旨在养成素养以及培养辨别与活动相关的意义的辨别能力。由此,真正的教学不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因为被告知事实是什么实际上阻碍了听者获得辨别能力、灵巧能力和鉴赏力,而只有这些能力才能使人们与本质的东西契合为一。因此,好的教学经常需要教师抵抗说出其所知道的东西的诱惑,因为那样会缩短了学习的过程,而恰恰是这一亲身体验学习的过程富裕了学生意义感,对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有了感觉。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说,教比学更难,因为教意味着“让一学习”(let-learn)。真正的教师除了学习本身以外一无所教。^⑨课堂教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让学生进入教学所开启的复杂世界之中,去自主地获得辨别能力、灵巧能力、鉴赏力,获得自主行动的能力,这样的教学就是指向公共生活、孕育公民行动能力的教学。

指向公共生活的教学,还需要超越知识的简单授受,而上升到知识的社会关怀,培育社会理想。2009年9月8日美国学生开学日,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讲演中说,“你们需要在数理科学课程上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去治疗癌症、艾滋那样的疾病,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你们需要在历史社科课程上培养出的观察力与判断力,来减轻和消除无家可归与贫困、犯罪问题和各种歧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公平和自由;你们需要在各类课程中逐渐累积和发展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思维,去创业和建立新的公司与企业,来制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天赋、技能和才智,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假如你不这么做——假如你放弃学习——那么你不仅是放弃了自己,也是放弃了你的国家。”^⑩唤起知识学习的社会关怀,让学生从纯然知识的习得过程中获得开阔的社会视野,这对于公民意识的养成无疑是重要的基础。

好的课堂,不仅能够让学生从中习得知识本身,感悟文化价值,而且也能够让学生从中唤醒生活记忆,追求美好的生命理想。“许而权20世纪30年代在故乡的立本小学求学,七十年后回忆当年的课堂还是历历在目:自然课,教师带领学生去野外捕捉昆虫、采集植物茎叶制作标本,以增强学生的感性知识;地理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山头附近一个地方挖掘化石,帮助学生理解化石成因;美术课,教师则让学生到马横溪实地写生,领略家乡自然风光;五、六年级设置了实用的珠算课程;至于体育课更是丰富多彩,有踢毽子、跳绳、滚铁环、打乒乓球、跳高、跳远、拔河等活动。”^⑪70年后依然保存下来的珍贵记忆,其中所蕴含的正是课堂教学中所彰显

出来的自由、丰富、美好、健康、活泼等公共价值。课堂教学作为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形式,正在于在教学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爱、美、自由、丰富、健康、活泼等公共价值。

三、社团活动与学校生活中广泛的行动

如果说课堂教学更多地乃是以教师为主导而展开的体制化的公共活动,那么社团活动就更多地是以学生为主导而展开的更具自由与开放品质的公共活动。社团活动同样是学校公共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培养学生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载体。“南开学校为训练学生做事能力,服务精神,并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起见,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通力合作,团结负责。当年最早成立之学生社团,有自治励学会,由今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君主持之;有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君主持之;此外并有青年会,专以研究基督教义为任务,由张信天君主持之。皆各有定期出版刊物,彼此观摩竞赛,工作成绩颇足称道。”^⑫各种社团、组织,在练就学生的做事能力之时,也培育了他们的合作意识与服务精神,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们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能力。

社团活动不仅活跃学生的学习生活,也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自我展现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地感受到生命成长的欢乐,也让学校空间洋溢着青春朝气。南开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结精神,由学校派有专人指导,成立各种各样的课外组织活动,同学们可根据各人的爱好,自由参加。“每天下午放学后,学生们就各自去参加课外活动了。这些课外组织有: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青年会、童子军、新剧团、国剧社以及各种体育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和出版刊物,等等,其中以新剧团、体育会两个组织最为活跃。南开的新剧团,最初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言说能力,并利用剧情,针砭时弊。先生对新剧团负责了启蒙第一课,以后即由师生共同创作,共同演出。剧团每在校庆日,公开演出,一连两天,轰动一时。除校庆日之外,每周星期六或一般小的节日,也有演出。学生们花费一角钱,买上一张票附带一包糖果,又看、又吃、又玩,师生同乐。”^⑬

社团也是个体与社会链接的有效中介。社团活动的开展,可以让学生学会彼此合作,结成共同体,相互关爱,相互协作,共同成长,也共同承担,这对于个体公民品质的历练是重要的尝试。以民国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例,教育学系的学生经常利用节假日,举行团体活动,以培养团结合作的能力比较有影响的有:全院师生同乐会;滇籍学生组织生活教育团,暑假中赴各县考察教育及社会实况;成立纪念日所举行的“传播光明”表演(亦可称集团游戏);与昆明市政府合办的儿童节庆祝会及儿童抗战画展。^⑭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读书不忘国事,‘九一八’事变发生,随即掀起一股爱国热潮,几乎全体同学都忙碌起来了。同学们分头组织各种宣传机构,例如街头话剧团,分头组织各种宣传机构,例如街头话剧团,演讲队等,到各处去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并且设法募集款项,购买应用物品,赠送前方战士。后来,榆关失陷,何柱国旅长退守秦皇岛,为要鼓舞军心,我们组织一些慰劳团,每团有男女同学十余人,携带大批钢盔、棉衣及日用品,前往秦皇岛、热河及其他地方。”^⑮在这里,各种戏剧社团就成了学校与社会、民众链接的有机桥梁。

学生进入公共生活,既需要学生个体从学业压力中超越出来,同时也需要学校生活能呈现出开阔的公共生活视野,学生进入其中可以自由选择,并使自己得到历练,个性得以彰显。由于社团参与往往基于个人的自愿以及个性特点,社团就成了显现、凝聚众多富于个性的学生的平台;同时,社团又是兴趣相投的学生的集合,换言之,进入社团,意味着学生个性需要以符合社团之作为公共交往场域的要求与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学校社团活动乃是学生个性以

公共性的方式得到展现、孕育、提升的有效形式。对于学生成长而言,学校生活中的社团以及社团活动可谓个性与公共性有机融合的重要场域。“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做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⑥学生时代的这种经历,对于年轻人的个性展示乃至一生的兴趣发展都是重要的磨砺。

尼采在回忆自己的中学生活时这样写道,“我们应该无比感谢那个特别的小团体,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只是我们中学学习的补充,而完全是真正富有成果的交往,在它的氛围中,我们把我们的中学也只当做服务于我们的一般教育努力的个别手段。我们发现,多亏我们的小团体,当时我们压根儿不去想所谓职业的问题。国家要尽快为自己培养出合用的公务员,通过负担过重的考试保证他们的绝对顺从,为此频繁地剥削中学生的年华,而这一切被我们的自我教育拒于千里之外;任何功利的考虑,任何飞黄腾达的意图,都不能支配我们,一个今天仍使我们中每一人感到安慰的事实是,我们俩现在还不真正知道将来要做什么,而且我们对此毫不忧虑。我们的小团体在我们身上哺育了这种幸运的无忧无虑;正是为了这,我们在纪念它的时候心怀由衷的感激。”^⑦从尼采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团体之于学生发展的意义,首先是提供一种交往的方式,在其中,获得学习生活的有益补充;其次是作为自我教育的基本形式;第三是在体制化学校生活之中,给孩子们的成长开辟空间,成为个体成长的必要的庇护之所,并给个体人生发展提供长久的精神资源。

正如钱穆在新亚校歌中所言,“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伴向前行”,青春结伴,不仅是青春存在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年轻人互相帮助、彼此携手、跨越艰难险阻、勇担重任的庇护之所。这种“趁青春,结伴向前行”的新亚气象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新亚教育认为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活在历史传统文化社群当中。个体只有在种种人伦关系的实现中,在学问与事业的追求中,在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中,人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人格,才谈得上活的幸福活的有价值。”^⑧团队生活对于年轻人的幸福成长与人格完成,乃是不可或缺的珍贵经历。

四、社会服务与公共理解的扩展

“柏拉图说,一个人只有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使自己的道德真正完善起来。雅典人因为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个人的事情而获得了拯救。我们的 idiot(白痴)这个词源于希腊人对对公共事务不负任何责任的人的称呼。修昔底德记下了伯里克利曾在葬礼上讲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允许一个人汲汲于个人的事务而不理会公众的事务。我们和其他的城邦不同,因为我们认为一个远离公众生活的人是无用的人,然而我们的精神是独立的、完全自主的,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⑨在希腊人看来,人之置于城邦之中,服务于城邦,这几乎就是人性的全部,离开了城邦,则与白痴无异。这提示我们个体发展的根本向度,也就是指向国家社会,服务国家社会,乃是个体成长的根本方向。

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传达的教育理念是,个体发展的目标乃是凭

借对真理的追求来通达个人自由,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整与独立,最终以成熟的人格进入社会,服务于社会。服务社会可以说是个体人格形成的最终指向,也是公民教育实践的最终的演练场和试金石。社会服务首先意味着个体关切他人和世界的积极意向,这首先指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其次涉及个体的社会行动能力,这主要涵括知识技能和能力发展。引导个体在学校教育过程之中更多地践行社会服务,其目标同样包括个体之于社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两相比较,前者更为基本。

社会服务的过程,乃是个体以身心直接地与周遭世界相遇的过程。通过具体的社会服务活动,进而促使个体真实地走进社会,走向他者,形成个体与他人的共在。一个人成年以后对他人和世界所有深刻和远大的认识,往往都源于年少时期对身边事物的发现和理解。社会服务的过程绝非单向度施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与他人积极互动的过程。积极的社会服务,让我们活在他人与社会之中,在启迪个体向着他人和社会而生存的生命姿态之时,也让社会生活实际向着个体生存涌流,由此而内在扩展了个体生存的现实内涵。这意味着社会服务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提高的一个过程。

社会服务为智力、道德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舞台,社会服务的深化可以极大地深化个人的公共理解和公民行动能力。“如果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从事社会服务,那么社会服务就会成为他终身的指导原则,帮助他一生笃行正道,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²⁰当然,参与社会服务绝非任意而为,或者停留在让他们从中体验到走向社会的兴奋感,也绝非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流于形式,这样就不足以构成对个体公民道德的真正历练。“为了持续地推进社会进步,就需要开展系统化的社会行动。而参与系统化的社会行动就需要接受纪律的约束。青少年已经具备理解各种社会进程的能力,并且能够适应纪律的约束。”²¹

不仅如此,社会服务活动的参与,本身也是个体自我公民身份的一种彰显。换言之,社会服务并不是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可有可无的活动,同时也是贯穿在个体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责任,反过来,个体在真实的社会服务活动过程中,也将不断拓展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解以及深化对于公民责任的担当。惟有当一个人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真实地融入他人和社会,一个人才可能培育出刻骨铭心的向着他人和社会而生的积极情感。这对于一个人形成健全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人格,乃是极其重要的。年少时其逐渐形成的个体之于社会的深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体验与认同,对于一个人成年之后成为卓越的公民,可谓不可能的经历。

个体参与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不仅是唤起个体超越自我、进入公共生活共同体的生存意向的过程,同时也是切实地培养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积极责任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却不需负责。……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智识上讲,它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者相适应。”²²引导学生更多地从事踏实的社会服务,就是要超越一种对社会的浪漫的责任意识,在实际的参与与锻炼过程中,切实地思考、判断、理解、认同个人之于社会的责任担当,并一点一滴提升自己的行为能力,由此而把责任意识的扩展与个体行动结合起来。当我们强调个体的亲社会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之时,并不意味着社会服务能力的不重要,恰恰社会服务能力乃是个体亲社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真实载体。离开了切实的社会服务能力,我们的亲社会情感态度价值观难免流于空乏而无力。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服务能力并不等于我们个体静态的能力素质。我们常言先学好本领,今后再用之于社会,在这里,所谓本领或能力,乃是一种仅仅关乎个人的孤立性的

素养,没有看到个体的社会服务能力本身就离不开必要的社会历练,离不开个体在社会场域中的自主发现、选择、行动的能力。我们服务社会,谁需要我们的服务,如何服务?这些都需要我们能找到切实地进入社会的路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报酬,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恰当地使用了这一技术。”^{②4}这意味着衡量一个人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并不是看一个人静态的能力素质,而要看这个人如何恰当地使用这种素质。对于社会而言,我们不仅是作为想爱者,也就是想要表达我们对他人和社会的爱的人,而且作为能爱者,也就是能从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出发来践行我们的爱心,由此而寻求恰切地进入公共生活的方式。社会服务作为学校教育实践的一部分,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从小就引导个体学会从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中来寻求自我才能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五、学校公共生活中的学生自主与学生自治

公民德性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来自行动。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写“美国的居民不从书本去汲取实际知识和实证思想。书本知识只能培养他们接受实际知识和实证思想的能力,但不能向他们直接提供这些东西。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而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社会的主要工作,每天都是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他们的手来完成的。”^{②5}

公民教育最好的方式就是实际锻炼,也就是让学生去亲力亲为,参与实践,践行一种真实的公共生活,孕育初始性的公民人格。学校生活中的广泛自治,就是学校场域中公民教育的典型实践样式。亦如杜威所反复强调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关键,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这样表达出来:在形成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的过程中,必需要有每一个成熟的人的参与”。^{②6}民主正是在大众的参与中不断创造发展它自身。杜威1919年在中国的演讲中提出“民治就是教育,便是继续不断的教育”。这里的“民治”就是当时对英文中“民主”一词 democracy 的翻译。^{②7}学生自治的过程,本身就是他们在自治的活动之中习得、扩展、反思、提升自我民主生活经验的过程,因而也成为他们自我教育的过程。

范用在介绍他的小学记忆时,具体提到了其在穆源小学的学习生活场景,写道“上五年级时,我们的墙报叫做《牧园》。我们是一群小绵羊,老师就是放牧人,我们在他的精心护育下成长。壁报内容,有文有图,有一些栏目,比如:周话、老师的期望、小故事、我的歌、涂涂画画、剪剪贴贴、小信箱、小广播等等。办墙报,开头请老师指导,做个样子,以后,就由我们自己动脑子,自己动手。在我们那个时候,镇江的十几个小学还联合办了个铅印的小刊物,课本那样大小,专门刊登作文。看到自己的作文用铅字印出来,你可以想象,那高兴劲儿有多大!”^{②8}学生们参与办墙报,起先请老师做指导,随后就开始了学生自主办报之路。从墙报的整体设计,到每一板块的内容筛选,再到文字和图画的成型,每一部分都是学生们自己自发参与,亲力亲为,独立思考,一是锻炼了能力,二是培养的兴趣,三是学会了过团体生活。学生的自主与自治,让学生得以在学校公共生活中积极主动地显示、证明自我存在的独立价值,也显现出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关切。学生们投入其中,激发自我进入公共生活的热情与想象力,也让孩子们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得到引导和发扬,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培育了他们的公共情怀。

张伯苓在南开学校的训练方针,同样注重对于学生自主参与团体组织这一行为的鼓励和倡导。以出版为例,“学校为练习学生写作之能力,增加学生发表思想之机会,自始即鼓励学生编辑刊物。会有会刊,校有校刊。或以周,或以季,种类甚多。于彼此观摩之中,寓公开竞

赛之意。以使南开学校并未设有新闻学课程,亦未添设新闻学科系,但毕业校友之服务新闻界、通讯社,以及文化团体而卓有成绩者,为数尚不少。”²⁹学生在学校中的各种写作、编辑的训练,不仅成为他们今后职业人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中学生活阶段得到锻炼,让中学生活本身充实,富于意义。

我们再来看大学生活中的学生自治。以过去的燕京大学为例,“校方寓教育于生活之中,因此我们的生活就是最具体的教育了。这又是校方至高最妙的策略,即成立一个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完全是自由民主的体制,依自由投票选举而组成的。当选会长的自然是资深、才能兼备、众望所归的老大哥或老大姐。其他职员也是各有所长,品学优良的能者。每年举行一次竞选活动,机会平等,任由角逐。学生自治会本身就是一门人生课程,在这个小社会里实习如何筹划推进会务,做人做事,分工合作,解决困难,为全体同学安排舒适的生活,及有益身心的活动和娱乐,同时是自愿奉献课余时间与精力,开始为人群服务。历届的会长与各部职员,费无限心神、气力和时间,乐意为全体同学服务,任劳任怨,但求尽忠职守。他们设法经常为十座男女生宿舍,及附设的饭堂,维持良好秩序,招请厨师办理适当的膳食。分配各种运动的场地和时间,选择及安排合时合适的娱乐节目,按节序组织参观团和旅行团,及编印多种刊物。”³⁰学生自治实际上让整个校园都成为学生自我教育与成长的学园与家园。

学生自主和学生自治,可谓现代社会与教育中儿童立场凸显的文化实践。这意味着学生自主与学生自治,不仅是他们的天性 with 潜能激活、促进他们自主发展自我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与教育发展的需要,甚至,也是儿童成长的一种权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拥有切实的儿童立场,充分尊重他们,并且相信他们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在过去得到证明,在今天同样不乏有益的尝试。以安排座位为例,我们要么习惯于按照成绩好坏来安排,要么按照高矮秩序安排,大致都是按照我们给出的秩序逻辑来安排,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的夏昆老师就做了另一种安排:³¹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没有想出个头绪,直到我和孩子们一起来到教室门前,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终于决定了:不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

门开了,孩子们问我“老师,坐位怎么安排?”

我说“自己进去,选最喜欢的位子,随便坐!”

孩子们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鱼贯而入,很快坐在了坐位上。我们新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一个多月之后的一次班会课上,我才这样告诉学生:“班集体是我们自己的,坐位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从来没有将座位作为惩罚或者表扬学生的手段的习惯,因为在这个教室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一员,座位没有尊卑之别,正如人没有高下之分。在我的班里面,如果谁想调换座位,一般是通过你们自己协商的途径,我不会对你们的座位横加干涉。但是,也希望每位同学明白,座位对大家的学习是有影响的,我相信大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Sally 因为家里的事情,开学之后一个月才到学校,座位安排在最后一排。有一天她告诉我:想调到前排坐。我告诉了她我安排座位的事情,并说如果有同学愿意和她调换,她就可以坐到前面。几天后,她说不好意思去问同学。我说我也不能对别人的座位加以干涉,但是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桌子移到前排的走廊上,因为每周我们都要调换组与组的座位,那么下周就会是别的同学坐那里了,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她照办了,于是,在走廊上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位子。

几天以后,另一位男同学找到我,说要调换座位,我问他原因,他说在原来的座位上老是管不住自己,要和旁边的同学说话,我说你找到愿意和你调换的同学了吗,他说找到了,我告诉他,这说明你已经有了控制自己的能力,恭喜你!我同意你的请求!

“班集体是我们自己的,座位也是我们自己的。”这是对学生班级生活权利的认同,每个学生都平等地作为班级生活的主体,班主任并没有予取予夺的大权。“在我的班里面,如果谁想调换座位,一般是通过你们自己协商的途径,我不会对你们的座位横加干涉。但是,也希望每位同学明白,座位对大家的学习是有影响的,我相信大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让学生以自己协商的方式解决,既是对学生能力的信任,同时也让学生学会相互协商,这对于学生民主性格的养成无疑是良好的训练。当我们切实地相信学生,激励学生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协调,学生的自主思考、自主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负责的意识就会得到磨练,就更容易被激发出来。而恰恰是我们从骨子里对学生的不信任,弱化了学生自我成长的可能性。正如夏昆老师所言“靠控制学生的座位来达到控制学生的目的,还不如干脆把权力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选择,并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他们正在长大,需要我们给他们长大的机会。”

鼓励学生自治,乃是建立在对学生的基本权利的认可和能力的信任之上,尊重他们在学校公共生活中的基本权利,相信他们拥有自主思考、发现、判断、决策的潜能,由此而充分激发学生的自主性,让他们的潜能显现出来,成为他们更好地进入公共生活的实际能力,也让他们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凸显,让他们懂得什么事情是可以而且应该自己做主的。我们常常习惯于替代,潜在的观念就是学生无法做好,一放就乱。这其中,隐含的主旨就是不相信学生,不承认也没有意识到学生的基本权利,由此而来,学生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学生的自主意识也得不到有效提升。这样的结果是学生的公共生活能力和意识得不到发挥,更重要的是许多时候我们也漠视了学生的基本权利。切实地树立儿童本位,承认他们在学校公共生活中的基本权利,相信学生,给他们提供充分的平台,给予学生尝试错误的机会,在日常教育生活中也能得到良好的历练,让他们在自我尝试与自我发现中成长。这其中,实际上蕴含了学校公民教育的真谛,那就是怎样在一点一滴的日常行动之中,训练、提升学生个体的公共理解、公共参与的意识与能力,培育个体的公共德性。

学生自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集体规约。倡导学生自主与学生自治,其核心精神乃是教育的民主化。我们习惯于各种班级班规,甚至把学生制定各种班级规章制度看成班级管理民主管理的代名词。学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班级管理并非一蹴而就,这意味着班级的民主管理,绝不是民主地弄一套并不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制度就完事,而是必须使得整个班级管理的过程成为学生理性逐渐发展的过程,班级管理必须给学生以尝试错误的空间。对于未完成中的学生个体,一旦用太多规范的形式,就将他们尝试错误的空间大大压缩,尝试错误空间的缩减意味着个体自由行动的空间,即人性的缩减,人的发展就被缩减成为预先所定的规矩。教育的目的是人,班级管理应该是给人提供充分的空间。正如作为民主理念重要代表的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所提到的,给孩子们规矩应该越少越好,对他们习惯的养成,只能一条条做起来。那种事无巨细、一网打尽,把学生整个学校生活都规范起来的班级管理方法,除了削弱学生在班级生活中的生命活力,减少他们常识错误的机会,就只能达到管住每个学生的目的。这也是杜威强调道德发展的过程应该是学生置身道德问题情境中主动探究、获得自我成长的过程。杜威的民主教育过程,其要义有两点:一是没有特定的道德标准,是一种开放的道德理念,是让个体获得自身的成长,而非达到个体对外在标准的契合;二是强调个体置于道德问题的情景中,通过对道德问题进行自由探究,而非对结论的简单认同作为个体道德发展的

基本形式。正是开放的道德观和基于探究的道德情景,促成个体自我的积极成长。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开篇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在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任何对于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所可尝试之事务的数量,从而亦会降低进步的速率。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行动的自由之所以被赋予个人,并不是因为自由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满足,而是因为如果他被允许按其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一般来讲,他将比他按照我们所知的任何命令方式去行事,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人。”^⑩这段话可以作为学生自主和自治的经典注脚:让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中尽可能多地学会去自由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发现、组织、设计、创造,远比按照老师的指令行事,更能培养他们如何更好地服务他人和社会。

注 释:

- ①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1997年,北京:三联书店,第95页。
- ②③⑪⑫⑬傅国涌《过去的小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年,第20-21、68、236、68-69、49-51页。
- ④该案例由李卫提供。
- ⑤⑥⑭[美]约翰·杜威著《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32-33、43页。
- ⑦刘铁芳《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 ⑧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年第1期。
- ⑨参见马克·莱索《我们仍然需要面向思的教育——海德格尔论技术时代的教育》,蒋开君译,《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
- ⑩奥巴马《对于自己的教育,你们中每一个人的责任》,参见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714cbclfc5da50e2524d7f1e.html>。
- ⑪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刘铁芳主编《新教育的精神:重温逝去的思想传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
- ⑫⑬⑭⑮⑯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86-87、288、352-353、282-283页。
- 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一·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 ⑱[德]尼采著《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 ⑲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6页。
- ⑳[美]依迪丝·汉密尔顿著《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 ㉑㉒苏娜《青少年道德赋能行动研究框架》,《教育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
- ㉓㉔㉕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1997年,北京:三联书店,第1、97、1页。
- ㉖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3页。
- ㉗参见[美]约翰·杜威著《杜威五大讲演》,胡适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 ㉘刘铁芳《新教育的精神:重温逝去的思想传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1页。
- ㉙夏昆《率性教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